

文史博览

李清照为何去海上找宋高宗

□刘黎平

赵明诚夫妇面对考验

赵明诚与李清照是幸福的一对,然而,他们不幸都踩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靖康之难爆发了。战乱,对于这样一个小资家庭而言,有两重的考验。

第一重:生离死别的考验。第二重:担当民族救亡任务的考验。

赵哥和李美眉是怎样面对这种考验的?首先,在生离死别中,这小两口还有一个使命:文化使命。小两口收藏了大量的书、画、舞、鼎,在战乱中,由小两口带着这些重量级文物跑,不仅有文化含量,更有物理上的重量,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更难堪的,赵先生是个有朝廷使命的人,不能乱跑,重担就落在柔弱的李清照身上,李姐问赵哥哥:“万一乱兵来了,我咋办?哪些该扔?哪些该拿?”

当时赵先生对老婆做指示:先扔辎重,接着扔衣被,实在不行了,才可以扔书画,如果扔书画还不行,只好扔古代器皿,但是有一条原则不能动,那些商朝周朝的鼎,绝对不能扔,如果到了最后的关头,亲爱的老婆,我劝你抱着它们同归于尽——“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

被误解为内奸

麻烦来了,就在1129年,一个叫张飞卿的学士,拿了一个玉壶给李清照两口子看,估计是要他们鉴定,两口子看了之后,说这是珉,一种像玉的石头。三人谈了很久,之后,张飞卿拿着玉壶走了。

很普通的一起鉴定,居然被扭成一起政治事件,人们纷纷传说:“不得了啦,赵明诚李清照那两口子,吃着大宋的皇粮,居然去勾结金国。你们不信?那天晚上他们就拿了一件玉壶,要张飞卿献给金国的金兀术,表示投款效忠,然后要将十五车的珍贵文物献给金国。”

紧接着,有人向朝廷告密。内奸罪是战时最严重的罪行,可谓人人得而诛之。只会写诗词,玩赏文物的李清照姐姐,哪里当得起这样的曲解和惊吓,她将家里所有的文物打包运输,打算送到大宋朝廷去,表白自己的忠心。

赵明诚曾经临阵脱逃

李清照之所以如此惊惶,还有一重因素,就是因为她老公曾有过不良表现。赵明诚是个纯粹的文人,软弱,担当不起民族危亡时刻的重任,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第二重考验。

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公元1128年,赵明诚任江宁知府,第二年,在赵明城管辖区内的御营统治



国画作品中的李清照形象。

曾国藩以死相威胁对弟弟下“限购令”

1860年,曾国藩在安徽的安庆,身份是“署两江总督”,即代理总督。这一年的形势如何?诚如他在农历十月初四给朝廷的奏章里写的:“已有应接不暇之势,皖南立脚未稳。”说明他在军事上很被动,而且对局势很没有信心,就在同一天,他写信给家乡的弟弟,焦虑之情跃然纸上。

老曾听说弟弟们要在他们所住的黄金庄买建房,所谓起屋,就是建房,对于此事,他很着急,很生气,说:做哥哥的怕你们在家乡多置田地,多建房屋,那简直是在加重我的罪孽,让我的“寸心”大为不安。以至于说:“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活着的时候不安,死了不安,几乎是拐着弯说要以死相威胁。

除了以死相威胁,还以兄弟感情相威胁。他进一步说:你们要是听哥哥的,停止买田建房,哥哥我就感激你们;要是不听,哥哥我就恨你们。言下之意就是要断交了。

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其实已经有点看空清朝,对晚清的局势没有多少信心,这种看法是建立在英法联军入京,太平军咄咄逼人的基础上的,鉴于这种形势,老

陆茂清

曾十万火急地写信回家制止弟弟们购置物业田地,几乎以死相威胁,命令弟弟们“限购”。因为多一处庄园就多一分危险,就多一分指责,多置财产根本没有益处。如果天下太平,就不怕没饭吃。

所以说,曾国藩的清廉,一方面是因为遵守中国古来圣贤的教诲,克制私欲,安贫乐道,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危机感,而且这种危机感是出于他的亲身经历。

多多购置产业,是很多人应对贬值危机,为子孙和自己养老提供物质保障的一个重要手段,曾国藩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呢?

我想,主要是因为老曾的危机感不只是停留在物质财富保值层面,还进一步上升到精神财富保值层面。

依靠产业来保障子孙家人,其实是养成子孙家人对物质财富过度依赖,从而丧失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力,依赖越多,子孙越懒。在经济形势变化不大的农业社会尚且如此,在经济形势日新月异的市场社会,更是如此,固化的物业和产业,很可能成为子孙适应新的经济方式的一个障碍,弱化他们的生存技巧,这才是最大的危机。

(据《广州日报》)

邹韬奋不怕权要,毫不畏惧撰文给予反击。

这时,《生活》周刊又收到了读者陈淡泉来信,大意谓:王伯群趁着负责南京交通部办公楼及上海大学教学楼营建的机会,将婚房交“辛丰”营造商一并建造,将公款混用干私宅,要寻求《生活》周刊调查揭露。

其时,邹韬奋还听到各方关于王伯群贪污嫌疑的呼声,于是派记者明察暗访、多方调查得知,王氏的豪华婚房造价总计近50万元,装修布置费尚不在内,而王伯群只付了约18万元,大部分算在了公家账上。邹韬奋于是引起社会热议,谴责纷纷。王伯群以官位权势吓人,写信指责《生活》周刊诬蔑其人格,并刊登充分显示豪宅规模宏大的材料考究的5张照片,公开其偷天换日贪污公款中饱私囊的

丑行。

王伯群闻讯后又气又急,冥思苦想应对办法,决定“花钱消灾”,当即派亲信两人去见邹韬奋。

这两人本与邹韬奋熟识,寒暄几句过后话入正题:“王部长最近拨下巨款,补助上海各大小报馆。他平时最喜欢看《生活》周刊,情有独钟给《生活》补助10万元,属最多的一家。”韬奋当然明白对方来意,推辞说:“众所周知,《生活》是民间同仁入股办刊,向来不接受官方津贴,王部长的好意只能心领了。”

两人心犹不甘,喋喋不休又是劝又是央求邹韬奋给个面子收下,不然回去交不了差。韬奋莞尔一笑,将了对方一军:“这样吧,王部长既然如此的慷慨,那就把钱捐赠给仁济堂,用以赈灾救难,我现在就可通知他们来人办理捐款手续。”这两人哪敢答应,推说“待回去请示”,溜之大吉。

王伯群的“封口费”失效,8月15日,《生活》周刊6卷第34期上,刊出了读者陈淡泉的来信,邹韬奋配发的“编者的话”中,公告了王伯群贪污公款营造婚房的真相,包括记者与特约评估师调查经过,婚房占地、规模、楼层结构、建筑材料以及地价、造价等,让人一目了然,确信无疑。

邹韬奋的无情揭露鞭挞,令王伯群狼狈不堪,成了众矢之的,为缓和舆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弹劾案,迫使王伯群辞职。

(据《人民政协报》)

史海钩沉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没有“个人英雄”



▲ 人民英雄纪念碑。



▼ 《胜利渡长江》浮雕的局部。

新中国成立前夕,著名雕塑家滑田友给北京市建设局写信,建议在天安门广场建设一座雕塑建筑合组的纪念碑。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为纪念新旧民主革命时期牺牲的烈士,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兴建一座纪念碑。当天下午6时,毛泽东亲自为纪念碑奠基,就此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具代表性的大型公共艺术工程的序幕。

历经9年施工建设,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落成。碑身高37.94米,碑基占地约3100平方米,含地基总重约10000吨。即便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为保证纪念碑的建造质量,前后共花费了起码500万元人民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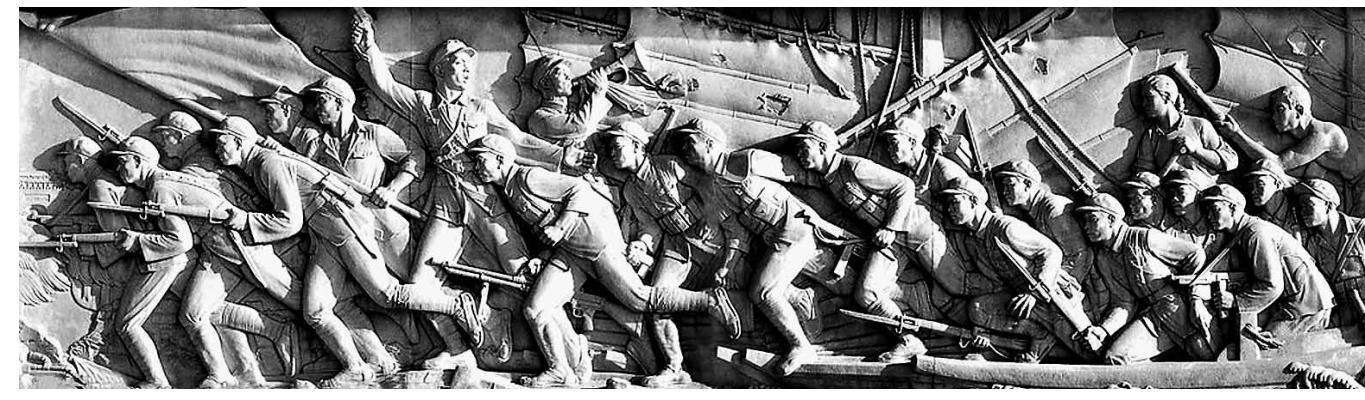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面刻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由毛泽东题写的大字,背面的碑文

由周恩来手书,在碑身左、右两侧刻着以红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装饰性花纹,纪念碑的高度比天安门城楼略高。

纪念碑最初背朝天安门,因为按照中国一直沿袭的南阳北阴传统,它本应面朝南,当时图纸也是这样设计的。1953年10月,用于题字的碑心石已经从青岛运来,正在吊装时,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看了一眼,说:“干吗庙门都朝南?”于是纪念碑以“扭转乾坤”之意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所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面是朝北的,这也方便了从天安门出来的群众能第一眼就看到毛泽东题写的鎏金大字。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民主人士相当关心此项公共艺术工程,他们经常来工地视察,但从不随意发表意见。邓小平有一回带女儿来,一下车他就说:“我不是代表领导来审查的”;周恩来也

(据《新京报》)



“四人帮”被捕当天都在干嘛

江青悠闲地去摘苹果,张春桥在物色“伴”……

江青到公园摘苹果



1976年10月6日的白天,江青并没有预感到这是她仅存的自由日。当天上午,她打电话给摄影师杜修贤,让他下午1点到毛泽东的住处“游泳池”来。杜修贤赶到时,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也来了。

江青大谈起中央局势:“中央领导人的排序要按主席生前排列的排,谁也不能改动……中央有人想整我,我不怕!”讲够了,江青才宣布:“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和大家合影。”

拍完照,杜修贤想走,被江青喊住了:“老杜别走!我们一起

去景山公园摘苹果,还要照一些照片。”说完后,江青笑眯眯地走进“大红旗”走了,工作人员坐着警卫局的面包车跟着。汽车从景山公园后门进去,开到一片苹果园旁。从车里出来,江青得意地说:“我们在这里劳动了好几次,特意留了几棵树今天摘,照些照片。老杜今天看你的啦!”直到晚霞染红天幕,江青才尽兴而返。

去找张春桥的。

和姚文元谈话时,张春桥攻

击华国锋对批邓不积极。姚文元等张春桥说得差不多了,才把他收到的两封信告诉张春桥。姚文元说:“我接到了两封信,里边说毛主席逝世后,可能立即宣布某某某是叛徒;这种问题并不一定是真的,但应提高警惕。”姚文元没有说信中写的就是张春桥的名字,而是用“某某某”代替,但张春桥没有问某某某是谁。

当天和张春桥谈完后,姚文元回到家里,总觉得心惊肉跳。吃完晚饭时,姚文元在饭桌上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难过,不要哭。”当时,小女儿

吓坏了,不懂姚文元这话的意思,姚文元安慰她:“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

张春桥收到“秘书”的档案

10月6日当天,关于张春桥还有一个插曲:上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从上海派机要交通员坐飞机,把一个标有“绝密”的信封直送中央办公厅,信封上注明“北京中央办公厅张春桥同志启”,里面装的是一个40来岁离异女干部的档案。

原来,几个月前,张春桥就

要徐景贤为他物色秘书,并给徐景贤送去一封“亲启”的“绝密”信,信中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一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此前,张春桥多次私下向妻子文静提出离婚,文静都没同意。

王洪文开会前看了会儿电视

10月6日晚王洪文落入法网前,还在钓鱼台住处的办公室待了一会儿,出来时看了一下手表说是还早,就坐下来和“王办”工作人员米士奇一起看电视。

王洪文当时也在和妻子崔根娣闹离婚。10月5日下午,他还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妻子,凄凉地说:“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接着,王洪文又写了张条子交给廖祖康说:“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她好。”

(据《三联生活周刊》)

原是度量单位

“寻”和“常”都是古代的度量单位。最早的度量方法是张开双臂,这个长度即称作一寻,一寻乃八尺。“倍寻谓之常。”也就是说,“常”是“寻”的两倍,即一丈六尺。因为“寻”、“常”是最普遍、经常使用的度量单位,“寻常”一词便引申为平常、普通的义项,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同时又引申出经常、平时之义,如“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据《新华每日电讯》)

揭露贪官,邹韬奋拒绝封口费

陆茂清

邹韬奋不怕权要,毫不畏惧撰文给予反击。

这时,《生活》周刊又收到了读者陈淡泉来信,大意谓:王伯群趁着负责南京交通部办公楼及上海大学教学楼营建的机会,将婚房交“辛丰”营造商一并建造,将公款混用干私宅,要寻求《生活》周刊调查揭露。

其时,邹韬奋还听到各方

关于王伯群贪污嫌疑的呼声,于是派记者明察暗访、多方调查得知,王氏的豪华婚房造价总计近50万元,装修布置费尚不在内,而王伯群只付了约18万元,大部分算在了公家账上。邹韬奋于是引起社会热议,谴责纷纷。王伯群以官位权势吓人,写信指责《生活》周刊诬蔑其人格,并刊登充分显示豪宅规模宏大的材料考究的5张照片,公开其偷天换日贪污公款中饱私囊的

丑行。

王伯群闻讯后又气又急,冥思苦想应对办法,决定“花钱消灾”,当即派亲信两人去见邹韬奋。

这两人本与邹韬奋熟识,寒暄几句过后话入正题:“王部长最近拨下巨款,补助上海各大小报馆。他平时最喜欢看《生活》周刊,情有独钟给《生活》补助10万元,属最多的一家。”韬奋当然明白对方来意,推辞说:“众所周知,《生活》是民间同仁入股办刊,向来不接受官方津贴,王部长的好意只能心领了。”

邹韬奋的无情揭露鞭挞,令王伯群狼狈不堪,成了众矢之的,为缓和舆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弹劾案,迫使王伯群辞职。

(据《人民政协报》)

原是乐器统称

八音是古代对乐器的统称。《周礼》中把乐器按制作材料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8类,称八音。金音包括编钟、特钟等;石音包括编磬、特磬等;土音包括埙等;革音包括鼓等;丝音包括古琴、古瑟等;木音包括柷、敔等;匏音包括笙、竽等;竹音包括箫、笛等。《三字经》中有“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之句。后来,“八音”用来泛指音乐,因此会发出音乐的盒子就被称为八音盒。(据《百科知识》)